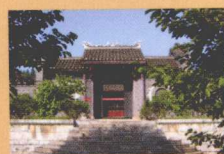


沃
野
耕
耘

贵州 民族文化遗产研究

吴正光 著



學苑出版社

本书由贵州省文物局资助出版

贵州民族文化遗产研究

吴正光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沃野耕耘：贵州民族文化遗产研究 / 吴正光著.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077-3302-0

I. 沃… II. 吴… III. 民族文化—文化遗产—贵州省—
文集 IV. K280.7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0029 号

责任编辑：洪文雄

整体设计：徐徐书装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yg@sina.com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 67678944 67601101 (邮购)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 厂：北京市达利天成印刷装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 × 1168 1/16

印 张：37

字 数：825 千字

印 数：1000 册

版 次：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86.00 元

序 一

马自树

我认识正光同志是在1983年冬。当时我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一个重要任务是联系文物方面的事。正光同志是贵州省文化厅文物处负责人，他到中南海中宣部汇报遵义会议50周年纪念活动有关事宜，由我接待，从此相识。光阴似箭，至今25年矣！后来我到国家文物局工作，与正光同志接触多了起来，彼此便由相识而相知了。新世纪到来之际，我们都退休了，接触虽少了些，但经常在报章上看到正光同志的文章，便知道这位苗族兄弟是“退而不休”，一如既往地继续着他钟爱的事业。不是么，一部数十万言的文集《沃野耕耘——贵州民族文化遗产研究》（以下简称《沃野耕耘》）出版了，实在是一件值得高兴、值得祝贺的事情！

正光同志大学念历史专业，而其本人又是苗族，这样的知识、身份背景，使得他在贵州这样一个少数民族众多的省份从事文物工作，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可谓得心应手。他用心工作，走遍贵州的山山水水。贵州68%的土地面积居住生活着少数民族，与这里17个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以及他们的历史传承相联系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便是贵州文物工作面对的基本形态。抓住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传承和利用，是做好贵州文物工作的关键。正光同志在主持文物处工作时，思路是很清晰的，始终把民族文化遗产作为工作的重点，不仅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上世纪80年代虽然还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法，但在实际工作中注意到诸如节日文化、服饰文化、生态文化、婚俗文化等内容的保护与传承，称之为民族、民俗文化，这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是基本一致的。

我们说用心工作，不仅是身体力行、积极勤奋，“用心”的意思还包括思考。“心之官则思”，就是在工作中要有理性思考的习惯。特别是文物工作，它有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对文物本身的内涵进行研究、阐释、宣传、教育，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实现文物的社会教育功能的最大化。我们从实际工作的同志，特别是担负一定领导工作的同志，能够站在政策的高度，站在更宏观的角度，将工作中的发现发明、经验教训，进行理性的梳理，写成文字，这不仅是自己心路历程的总结，是一段工作的纪录，更是一种社会责任的担当。在这方面，正光同志做到了，他的《沃野耕耘》的出版便是明证。

细读《沃野耕耘》，我们会感到有一种清晰纯朴的民族文化的魅力。文如其人。这本书快人快语，深入浅出，内容丰富多彩，文字却朴实无华。初步看来，这本著作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地域性。正光同志从年轻时候起，就来到祖国西南贵州这块神奇的土地，从事全省的文物工作，他的脚步，他的视野，触及全省的每一个地方。他熟悉这里的山形水系，熟悉这里的民风



马自树(前中)、吴正光(前右)及其好友们

民情，熟悉这里的文物遗产，心中所想、书中所写的东西，都是他熟悉的贵州。地域特点突出，每一篇文章都散发着贵州泥土的芬芳。贵州的历史，贵州的文化，贵州的文物，贵州的建筑，贵州的村寨，贵州的节日，贵州的服饰，贵州的蜡染，贵州的水和酒，贵州的歌和舞……读了之后，就会触摸到贵州的天地人和，从而产生强烈的“贵州印象”。

其次是民族性。前面说过，贵州是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这里文物工作对象主要是民族文物。既有物质形态的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又有大量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村寨、城堡营盘、民族技艺、民族服饰、民族节日、民族崇拜、民族婚恋，等等，这一切通过作者细致的笔触，在读者面前展现出贵州少数民族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百科式的画卷，是认识贵州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生活方式、民族风情、发展前景的指路标牌。贵州少数民族的历史，就是贵州的历史；贵州少数民族的文化，就是贵州的“名片”。贵州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创造，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遗产。认识和了解贵州少数民族的历史与贡献，对于加强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积极意义。从这个角度说，《沃野耕耘》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再次是专业性。本书是一本文化遗产研究文集，当然具有文化遗产内涵的专业性。我强调的专业性，在于作者是贵州文化遗产界的专业人士，并且多年担任领导工作，具有权威性。专业人士进行本专业工作研究、学术研究，写出专业性文章，这是地地道道的行家里手，在专业上是无懈可击的。我们在这里说的专业性，是整个文化遗产事业的专业性，不是某个单一专业（如书画研究、陶瓷研究）的专业性。本书的研究文章，不仅具有知识性、学术性，还涉及遗产管理方面的政策性。“文化旅游”、“红色之旅”的开展，如何做到“保护为主”，使遗产保护和旅游工作取得“双赢”，这就要有专业性的政策导向，局外人很难说得清楚。所以，本书的专业性，除政策把握之外，还涉及历史学、遗产学、文化学、博物馆学、民族学、民俗学、管理学等等，是行业的专业人士写就的专业之作，值得遗产界特别是贵州遗产界的重视。

文化需要积累，一代一代的积累，或大或小的积累，使得我们的文化源远流长。《沃野耕耘》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贵州文物、遗产工作的一个时代，所以，它的出版是很有意义的。

2008年8月18日于北京

序 二

祁庆富

1987年，我和吴正光先生相识在黔东名胜——镇远青龙洞。当时，他是贵州省文化厅文物处的负责人。此前，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学系与贵州省文化厅文物处已建立学术合作关系，民族学系83级学生毕业实习地点之一在苗岭山区雷山县的郎德上寨，具体任务是调查苗族村寨文化。1987年是双方第二次合作，具体任务是由当地基层文物工作者与民族学系84级学生共同组成若干调查组，分赴铜仁、遵义、安顺、毕节、黔南、黔东南、黔西南、六盘水以及贵阳市花溪区的26个县市60个乡镇110个村寨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节日文化调查，并收集相关的传承物和文物。调查前，省文化厅在镇远青龙洞举办“贵州少数民族节日文化培训班”，由各县选派文物工作者参加培训，我是授课教师，讲授“节日文化”。培训结束，吴正光先生到镇远青龙洞验收结业成果。对于这位中央民族学院早年毕业、已有相当名气的学长，我有几分好奇。直言不讳，快语连珠，不落俗套，不做作，不虚假，是我的第一印象。我感觉，他最关心的是与当地领导讨论青龙洞古建筑群的维修问题，对于我的节日文化授课情况似乎并不特感兴趣，没听说有汇报安排。吃过午饭，我把在学校组织学生编写并油印成册的《贵州少数民族节日文化研究资料书目》交给他，他对我的“热情度”明显升温：“看样子，你们真想为贵州民族文化做实事！”

为贵州民族文化做实事，是他工作和研究的基点，也是贵州文物部门与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学系合作的起点。

20世纪80年代，他以及他的贵州同仁们以创新精神，开创了新时期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发掘、抢救、保护、利用的新篇章。

早在1985年6月，经过认真准备，《贵州侗族建筑及风情展览》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拉开帷幕，参观者莫不对精美的鼓楼建筑艺术发出惊赞。时任外交部顾问的韩念龙先生陪同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苏联、瑞士、波兰、南斯拉夫、加纳、缅甸、朝鲜等30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和联合国官员共100多人，专程前往观看了侗族村寨的鼓楼和花桥模型、图片。联合国机构的一位官员感叹道：“中国侗族别具一格的建筑艺术，不仅是中国建筑的瑰宝，也是世界建筑艺术的瑰宝！”由侗族拦路酒开始，一系列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展演贯穿展览始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同志参观时高兴地和侗族姑娘一起在展厅踩歌堂。将风情展演和文物展览融为一体，是个突破性的创造。这个展览，在北京引起轰动效应，给少数民族文化殿堂吹起一阵清新强劲的“贵州风”。

以今天的观看定位，20多年前贵州的文化行动，以文物部门工作者开“民族文化”研究保护之先河，拉开的正是少数民族物质、非物质文化保护的序幕。

回想20年前的社会话语,可不像今天一样认识。在汹涌澎湃的经济发展的浪潮中,曾有人把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置之脑后,甚至把它看作现代化的“绊脚石”。贵州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是迷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是迷人的,在今日如火如荼的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热潮中,这话已被大多数人认同。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这可不是社会的共识。1987年上海的一家大报发表了一位“有经济头脑的人士”的一篇文章,题曰《迷人的陷阱》,文中对贵州,自然也包括侗族在内的“鼓楼”、“蜡染”、“节日文化”,嗤之以鼻,统统视为“陷阱”,对于“民族文化的挖掘、宣传、保护工作每年也都搞得轰轰烈烈”颇为愤懑,横加指责。正是在那样一种“语境”下,贵州迈开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坚实的脚步。1987年我亲身经历吴正光先生策划并实施的贵州节日文化保护行动,确实受到强烈的“文化震撼”。我被贵州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宝藏感染,也为贵州文化工作者的执著敬业精神感动。1988年,我在为贵州省文化厅文物处和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学系合作编辑的《贵州节日文化》一书提交的文章中由衷地写道:“贵州所做的挖掘、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更令人钦羡折服。看到了贵州文物、文化工作者兢兢业业脚踏实地的‘造化’之功:侗寨鼓楼、蜡染、编织、节日、酒、刺绣、民族村寨……一个颇为壮观的文化系列已初见端倪。我深深感到,贵州在文化方面,具有‘超前意识’,这里的实际工作,已走在全国的前面。”

正是对贵州多彩的民族文化进行发掘、保护、利用中形成共识,使我和吴正光学长结成二十几年如一日的朋友。他的追求、他的向往、他的辛劳、他的甘苦,我都可以体味。今天,他的结集大作《沃野耕耘——贵州民族文化遗产研究》即将付梓,令我百感交集。面对不假、不俗、不易吴学长,用简单的话语实在难以评说这部倾注了几十年心血铸成的“不简单”的论著。这是一部兢兢业业、脚踏实地的工作实录,也是一部呕心沥血、摸索探求的学术专著,还是一部独立思考、不落俗套的拓荒文集。

2007年,我写过一篇《论费孝通先生民族研究中的工作性》文章,认为费孝通先生修炼学问的“内功”,在新中国民族研究工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他关注现实问题,致力于少数民族的发展研究。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有一个不断适应的“文化自觉”的过程。费孝通先生的“工作性”给我们的启示应当是:所谓“纯学术”未必是学者的真经,人类学、民族学的前程“贵在应用”。作为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为中国的民族学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正是他在中国民族研究中身体力行的“工作性”的结晶。吴正光学长是费先生的真传弟子,具有民族史、民族学雄厚的基本功,他走的不是书斋学者之路,而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工作者。但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在胜任工作、完成任务的层面上,在兢兢业业工作的同时,呕心沥血地研究现实问题。他树立了文化工作中一个“研究型”的典范。《沃野耕耘》这部著作,就是吴学长文化工作中的研究性的证明。他注意书本,又不囿于书本,他的研究型集中体现在实地调查上,贵州民族文化散落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他的足迹和汗渍。

吴正光先生紧密结合工作,对贵州民族文化遗产进行数十年如一日的研究。他从事贵州民族文化实际工作,研究这一文化,热爱这一文化,几乎达到痴迷地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谈起贵州文化,他就目光发亮,口无遮拦,如数家珍。民族文化村寨文化保护,是他研究的核心,雷山县的

郎德苗寨，是他研究成果的典型。我国“实地民族文化村”的开拓，正是从吴正光先生的工作与研究中起步。他将物质、非物质文化融为一体进行整体性保护研究，这在国内是超前的，对后来兴起的整体性保护工作与研究做出了表率。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少数民族地区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传统与现代，不仅仅是少数民族面临的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日起，中国就出现文化反思热潮，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价成为热门话题。讨论“传统”，又离不开“现代”。今天我们特别关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要解决的也正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吴学长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民族文化保护专家，但他没有坠入“泛文化遗产保护”的陷阱。在他的研究中旗帜鲜明地表达出自己的保护理念：不是为保护而保护，而是为社会造福、为持有这些文化的老百姓造福。他在《民族村寨不是出土文物——兼论开放式保护民族村寨》一文中写道：

对民族村寨是实行开放式保护还是封闭式保护，学术界一直存在分歧。有人担心，对外开放会加速民族文化的消亡，或曰现代文明会“侵蚀、污染民族文化”。据权威人士披露，著名的生态博物馆学家——杰斯特龙先生“就怕现代化知识污染了这个(民族)文化”。这位先生看到咱们这些布依族的、苗族的、侗族的文化简直认为好得没法再好了，比他们的现代工业文化高明多了，就怕现代文化侵蚀了这些最好的文化。他希望我们的民族地区“慢一点现代化”。为此，他“总是在捍卫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很“不喜欢政府干预文化”。对于专家学者，民族村寨可以对其开放，但“开放是限量的，是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客人来了，村民“该种地的种地，该织布的织布，该吃饭的吃饭，该睡觉的睡觉”，千万“不要把自己降为展品，更不能兜售自己的用品”，否则就失去了“生活的本色，品格的本色”。

但是，笔者认为，如果真的那么做，则有悖于保护民族村寨的宗旨。保护民族村寨的目的绝不仅仅在于“为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史学等科学研究提供了活标本”，更重要的是要有利于村民的生存和发展，使被重点保护的典型民族村寨成为展示民族文化、创建精神文明的窗口。保护民族村寨，与保护出土文物不同。将活生生的民族村寨和发展中的村寨文化定格在某种发展水平上是不可取的。

这里，他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而又重大的理论问题，就是传统如何适应现代？他一针见血指出：

对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要作具体分析，即便是优良传统也应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否则民族文化难以存在下去。在保护民族村寨工作中，保护什么，继承什么，扬弃什么，必须尊重当地领导和村民群众的意愿，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不能照搬外国政府统治“土著民族”的那一套来对待我们的少数民族同胞。

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是吴正光先生这部著作闪光的亮点。

《沃野耕耘》付梓前，由衷地发了一通感言，是为序。

2008年9月于北京

前言

贵州是个多民族的省份，少数民族主要有苗、布依、侗、土家、彝、仡佬、水、回、白、瑶、壮、畲、毛南、蒙古、仡佬、满、羌等 17 个。其中布依族、仡佬族、水族人口均占国内本民族人口总数的 90% 以上，苗族、侗族人口占国内本民族人口总数的一半。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 38%。至 2006 年底，全省有 3 个自治州、11 个自治县、252 个民族乡，面积约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68%。民族的多样性，使各类文化遗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特征。

贵州各界有识之士，历来珍惜文化遗产。民国时期，已有意识地着手保护文物古迹，1938 年公布的《贵州省名胜处所保护管理办法》，明确对贵阳翠微阁、甲秀楼、浮玉桥、扶风山、黔灵山、照壁山、东山、仙人洞、水口寺等进行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继建立文物工作机构，陆续开展文物保护管理工作。1951 年成立贵州省文物审定委员会，1953 年筹建贵州省博物馆，1955 年筹建遵义会议纪念馆，其后不久即正式建立了贵州省博物馆和遵义会议纪念馆。为适应文物事业发展的需要，1975 年建立贵州省革命文物历史文物调查征集办公室，1981 年建立贵州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83 年在贵州省文化出版厅内建立文物处。此后，各地陆续建立文管会、文物科、文管所等机构。1995 年建立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0 年建立贵州省文物局（2007 年从正处级升为副厅级），2002 年建立贵州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至 2006 年底，全省共有各级文物保护管理机构 165 个，各族文物工作人员 1500 多人。

为摸清全省文物家底，贵州省文化局于 1979 年发出《关于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文物普查的通知》，从 1980 年至 1982 年，在全省范围内组织了 800 多人的文物普查队伍，普查地面文物 5000 多处，征集流散文物 3000 多件，拍摄文物照片 1 万多张，拓片 500 多幅，积累文物普查资料 4800 多份，3000 多万字。此后又多次开展文物复查、补查、核查工作，基本摸清了地面不可移动文物的历史、分布、现状和价值。在此基础上，编印了《贵州省文物概况一览表》，出版了《贵州省文物分布图》，为全省文物保护事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1983 年 8 月，“全国文物普查及文物志编写工作座谈会”在贵阳召开，称赞“贵州文物普查和文物志编写工作都走在全国各地的前面”。

通过多次文物调查、普查，分级公布了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文化街区名单。至 2007 年 6 月底，贵州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9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42 处，市、州、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2300 多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2 处，国家历史文化名镇 2 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1 处，省级历史文化名镇 17 处，国家历史文化名村 1 处，省级历史文化街区 2 处。30 年来，通过财政拨款、群众集资、社会赞助等渠道，筹集文物维修费 1.6 亿元，对镇

远青龙洞、遵义杨粲墓、大方奢香墓、从江增冲鼓楼、黎平地坪风雨桥、毕节大屯土司庄园、遵义会议会址、息烽集中营旧址等200多处文物古迹和革命遗址进行了维修。目前，利用经过维修的文物建筑，开办了民族建筑博物馆、民族节日博物馆、民族婚俗博物馆、民族戏剧博物馆、蜡染刺绣博物馆等各种专题博物馆、陈列室近百个，初步形成展示多彩贵州的文化系列史迹网。

贵州在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系统工程中，认真贯彻《文物保护法》，全面保护各类文物，特别注重保护少数民族村寨。1982年，贵州省文化局发出的《关于调查民族村寨的通知》指出：有选择地保护好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的民族村寨，对于研究贵州的建筑艺术、民族历史，进而建立一批露天民族民俗博物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86年，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公布《贵州省文物保护管理办法》，特设《民族文物》一章，规定要保护少数民族村寨。在此前后，全省各级文物部门重点调查了10多个民族的30多个自然村寨。经过多年努力，有效保护了一批典型的少数民族村寨，并以民族文化村、民族文物村、露天博物馆、村寨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等名义向公众开放。

与文物普查同时，全省各级文化文物部门还开展了民族节日调查，编印了《贵州省民族节日概况一览表》，收录民族节日1046次（处）。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坚持从本省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开展民族文物工作，采取了许多有别于其他省区的作法，诸如突出“三个重点”，实行“三个结合”，“逆时针”建馆，“立体化”办展，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突出“三个重点”

贵州是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内陆省份。贵州各族人民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开发贵州高原，创造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的特点。倘若机械地照搬其他省区的作法，用“一把尺子”量贵州，用“一个模式”框贵州，势必产生贵州无论地上地下、城市农村“都没有什么文物”的错误认识。

通过文物普查，我们认识到，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从本省实际出发，突出“三个重点”，开展文物研究和保护管理工作：在抓历史文物与民族文物时，重点抓好民族文物；在抓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物时，重点抓好地上文物；在抓城市文物与农村文物时，重点抓好农村文物。

抓好“三个重点”，是由贵州的民族特点和历史特点决定的。过去曾机械地套用“历史年代”这把尺子量贵州建筑，误认为贵州几乎没有什么“古建筑”，就连后来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的镇远青龙洞古建筑群，也因为“现存建筑是清代的”而看不上眼。若从贵州客观实际出发寻找历史发展见证，不难发现，大量的侗族鼓楼、戏楼、风雨桥以及彝族的土司庄园、苗族的干栏建筑和星散各地的乡规民约碑，都是具有文物保护价值的民族文化遗产。1985年在北京举办“贵州侗族建筑及风情展览”，展出侗族鼓楼、戏楼、风雨桥的照片、模型，并辅之以“鼓楼文化”活动表演，震动了首都各界。建筑学家们说，鼓楼、风雨桥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两个品种；民族学家及文物博物馆学家们说，侗族建筑是民族文化的瑰宝，历史文化的精华。展览结束后，大批专家学者，接踵来到贵州考察。于是，1988年国务院公布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时，出现了山地建筑的代表——镇远青龙洞古建筑群，和民族建筑的精华——从江增冲鼓楼、毕节彝族土司庄园的名字；2001年公布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时，出现了地坪风雨桥、郎德上寨

古建筑群的名字；2006年公布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时，出现了织金古建筑群、马头寨古建筑群、东山古建筑群、寨英古建筑群、思唐古建筑群、飞云崖古建筑群、旧州古建筑群的名字。“侗展”打开了思路：深山藏瑰宝！因此，在努力做好历史文物、城市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同时，特别注意做好民族文物、农村文物的保护管理工作。

贵州的另一个特点是，大量的文化遗存不只是埋藏在地下，还特别多地保存在民间。在内地，寻找历史见证主要靠地下发掘，而在贵州，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历史现象在民间即有物证。大量有形、无形文物即文物古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如历史发展的活化石，在现实生活中闪闪发光，其科学价值不亚于一件青铜器或一幅古字画。以民族取胜，以地上取胜，以农村取胜，是贵州民族文物工作的“三个重点”。

实行“三个结合”

将文物维修与博物馆建设相结合，文博工作与旅游开发相结合，文化工作与经济建设相结合，是贵州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在其发展进程中摸索出的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

按照常规，文物维修专款，只能用于维修文物本身。贵州在执行这条规定时，采取了灵活的做法，即将维修保护工作与管理使用相结合。每维修保护一处文物古迹，充分考虑如何管理好、使用好，以最大限度发挥其社会效益。具体作法是，将需要维修的文物古迹用来建立与之相宜的各种专题博物馆。如利用黄平“飞云崖”古建筑群开办民族节日博物馆，利用镇远“青龙洞”古建筑群开办民族建筑博物馆，利用台江“文昌宫”古建筑群开办苗族刺绣博物馆，利用安顺“府文庙”古建筑群开办蜡染文化博物馆，利用平坝“天台山”古建筑群开办民族戏剧博物馆，利用兴义“刘氏庄园”古建筑群开办民族婚俗博物馆，利用思南“府文庙”古建筑群开办乌江文化博物馆，利用铜仁“东山寺”古建筑群开办傩文化博物馆，利用遵义杨粲墓的辅助陈列室开办石刻艺术博物馆，利用大方奢香墓的辅助陈列室开办彝族文化博物馆等等。这样，将一个钱变成两个钱使用，既妥善保护了文物古迹，又发展了一批博物馆，一举两得，使文物保护与博物馆建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发展博物馆，如何布局最合理？贵州曾走过一段弯路。原想先在地、州、市、县所在地建馆，后来发现，由于种种原因，很难奏效。于是，改为配合旅游业的发展，在旅游热线上建馆。建立博物馆应方便广大群众参观。简言之：“博物馆需要有人看，旅游者需要有看的。”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在人流最多的旅游热线上建立博物馆，最能充分发挥民族文化遗产的社会效益，同时又能提高旅游业的经济效益。

除在维修与建馆问题上充分考虑经济效益外，在举办各种展览时也考虑到为发展具有贵州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的商品经济服务。举办“贵州酒文化展览”、“贵州蜡染文化展览”，目的就在于为发展商品经济服务。实践证明，将文化工作与经济建设相结合，对文化、经济都有利。

“逆时针”建馆

从前，要建立一个新的博物馆，通常程序是：第一步，先经有关部门下编制，然后调人筹建；第二步，申请基建指标；第三步，有了基建指标，抽人跑基建；第四步，基建完工后，申请经费征集文物；第五步，有了一定数量的藏品，再作计划办展览。为办展览，必有一定规模的设备。因

此，还得写报告，要经费，制作展柜、展架。这样的建馆程序，可称之为“顺时针”建馆。国内许多博物馆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然而，贵州如果这么走，很难行得通。贵州不可能预先为发展民族博物馆事业准备一笔够用的钱。于是乎，只好采用“逆时针”的方法，即先发动一些不在博物馆编制之内的人员征集文物，筹办一些小型多样的专题民族民俗文物展览，如上文提到的建筑文化、节日文化、蜡染文化、酒文化等展览，通过办展为建馆做准备，包括物质的、技术的和人员方面的准备。这样做的结果是，一个专题展览办下来，一个相应的专题博物馆的雏形就形成了。有的展览还未结束，甚至尚未开展，就有人要求把这个尚未出世的博物馆办在他们那里，只要文物部门答应将展品拨给他们，他们愿意出钱修建馆舍。

贵州通过举办各种专题民族文物展览，大大加快了发展各种专题民族博物馆的步伐。更为有趣的是，通过举办巡回展览，贵州的“流动博物馆”办到了北京、天津、西安、济南、青岛、淄博、徐州、无锡、南京、深圳、广州、顺德、重庆、成都、太原、呼和浩特等全国各地。自己的馆舍尚未建成之前（严格说来，是这个博物馆还未建立之前），其展品就在全各地展出了；而通过在外巡回展出，借用别人的设备推动自己建馆，这种“借鸡孵蛋”的办法，虽然是迫不得已采用的，但却是适应贵州省情的。

“立体化”办展

贵州举办各种专题民族文物展览，都是采用“立体化”的形式，即不单是平面地让观众看展品，还辅之其他手段，让观众得到多方面的享受，受到多层次的教育。以“节日文化展”为例，观众进入展厅之前，就能先在展厅外面看到苗族青年表演的“拦路鼓”，听到侗族青年演唱的“拦路歌”，尝到各族青年敬献的“拦路酒”；进入展厅，除可欣赏琳琅满目的节日服饰、民族乐器等精彩文物外，还可以敲铜鼓、吹芦笙，并与身着节日盛装、来自民族村寨的男女青年手拉手“踩铜鼓”、“踩歌堂”；有时还能品尝民族风味的节日饮食，选购具有民族特点的节日礼品。观众离开展厅，犹如“从侗村苗寨做客归来”一般。这种“立体化”的办展形式，打破了传统的办展方法，突破了一切展品都“不准触摸”、“不准照相”的禁令，使观众从欣赏式的参观转变为参与式的体察，使一向以严肃、清静为特征的博物馆活起来了。

笔者从1963年起，一直在贵州省文化部门工作。1979起，专门从事文物保护管理工作。1998年退休后，仍在省文化厅和省文物局的领导下，从事以编写《中国文物地图集·贵州分册》为主要内容的文化遗产研究工作。几十年来，结合本职工作，撰写了数百篇研究性文章，根据友人建议，以《沃野耕耘——贵州民族文化遗产研究》为名，分为建筑文化、节日文化、服饰文化、婚恋文化、石刻文化、生态文化、文化旅游、文保杂谈等部分结集出版。对未收录的文章，择其要者，存目备查。

参见本书作者关于贵州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方面的文章：

1980年

《重视民族文物工作》，载《贵州日报》1980年8月4日。

《搞好文物工作为四化建设服务》，载《贵州日报》1980年9月23日。

1983年

《文物普查和文物志编写促进了文物保护管理工作》，载《文物通讯》1983年第6期。

1984年

《在贵州发展民族民俗博物馆的设想》，载《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

1985年

《谈贵州民族民俗博物馆的建设》，载《中国博物馆》1985年第1期。

《努力做好民族文物工作》，载《贵阳晚报》1985年3月11日。

《“鼓楼文化”试探》，载《鼓楼文化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

《要认真保护民族文物》，载《贵州日报》1985年9月12日。

《要把珍贵的民族民俗文物抢救到手》，载《光明日报》1985年9月16日。

1986年

《发展我省文博事业的战略构思》，载《贵州文物》1986年第2期。

《发展小型多样的博物馆 充分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效益》，载《贵州文物》1986年第2期。

1988年

《改革中的贵州文物博物馆事业》，载《中国文物报》1988年10月21日。

1989年

《从贵州省情出发 发展贵州文物博物馆事业》，载《中国博物馆通讯》1989年第1期。

《贵州的系列专题博物馆》，载《中国博物馆》1989年第2期。

《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贵州文化史迹网》，载《文物工作》1989年第3期。

1990年

《从山沟走向世界——话说贵州丰富的民族文物》，载《贵州经济报》1990年1月8日。

《民族文化学与民俗博物馆》，载《贵州民族报》1990年1月27日。

《苗族龙舟博物馆刍议》，载《中国博物馆》1990年第2期。

《开创贵州文物工作新局面》，载《贵州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应在解决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方面作出贡献》，载民族出版《民族学研究》第9辑，民族出版社，1990。

1992年

《建立系列专题博物馆 促进民族地区发展》，载《文物工作》1992年第5期。

1993年

《透视贵州系列专题博物馆》，载《中国博物馆》1993年第4期。

《建立文化旅游史迹网》，载《贵州日报》1993年12月30日。

1994年

《贵州民族文化之窗——系列民俗博物馆》，载《民俗博物馆学刊》1994年创刊号。

《妥善保护与开发丰富多彩的民族文物》，载《贵州民族报》1994年1月27日。

《开辟民族文化窗口 促进贵州经济发展》，载《民族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

《贵州苗文化的保护与开发》，载《苗侗文坛》1994年第2期。

《浅谈我省彝族文物的保护管理和开发》，载《贵州民族报》1994年7月11日。

1995年

《办好民俗博物馆 促进文化旅游》，载《中国文物报》1995年6月11日。

《贵州系列民族民俗博物馆》，载《民俗博物馆学刊》1995年第2期。

《民俗博物馆与文化旅游》，载《贵州民族报》1995年7月24日。

《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贵州文化旅游史迹网》，载《贵州经济报》1995年11月21日。
《保护民族村寨 弘扬民族文化 发展民族经济——贵州民族村寨保护开发工作情况汇报》，载《贵州文物工作》1995年12月第4期。

1996年

《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相结合》，载《贵州日报》1996年1月17日。
《夜郎遗风拾零——各具特色的贵州系列专题博物馆》，载《文物天地》1996年1月第1期。
《贵州民族民俗博物馆巡礼》，载《当代贵州》1996年2月第2期。
《适应文化旅游需要 办活各类博物馆》，载《贵州日报》1996年3月22日。
《贵州民族村寨的保护与开发》，载《古建园林技术》1996年3月第1期。
《爱国主义教育的特殊课堂》，载《贵州政协报》1996年4月18日。
《贵州面具文化的社会功能和发展趋势》，载《贵州文史丛刊》1996年4月第2期。
《巩固 充实 完善 提高 发展 办活贵州系列专题博物馆》，载《文物工作》1996年6月第6期。

1997年

《贵州民族文物的调查征集与分类》，载《贵州文物工作》1997年1月第1期。
《夜郎遗风拾零——贵州系列专题博物馆观瞻》，载《贵州民族报》1997年1月9日。
《提高民族文物保护意识 加强民族文物保护工作》，载《贵州民族报》1997年5月5日。
《因地制宜做好贵州民族文物工作》，载《贵州民族报》1997年5月15日。
《斑斓多彩的贵州民族文物》，载《民族》1997年6月第6期。
《醉人的黔山风情——大型《贵州风情展》巡礼》，载《当代贵州》1997年7月第7期。
《丰富多彩的民俗“套餐”——贵州系列民俗博物馆一瞥》，载《四川民族经济报》1997年8月1日。
《贵州民族文物概述》，载《贵州文史丛刊》1997年8月第4期。
《发挥优势做好贵州革命文物工作》，载《文化广角》1997年10月第10期。
《应重视文物建筑周围环境的保护》，载《贵州日报》1997年11月28日。
《贵州民族文物概论》，载《贵州文物工作》1997年12月第4期。
《贵州系列民族民俗博物馆》，载《贵州文物工作》1997年12月第4期。

1998年

《呼吁加强民族文物保护》，载《贵州政协报》1998年1月1日。
《博物馆：大显身手正当时》，载《当代贵州》1998年1月第1期。
《贵州民族文物、文化概述》，载《学者笔下的贵州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
《古代铜鼓与现代苗俗》，载《中外文化交流》1998年4月第2期。
《营造良好的民族文化环境——我省保护民族村寨的实践与收获》，载《贵州日报》1998年5月7日。
《抢救民族文物 建设精神文明——贵州民族文物工作的探索与收获》，载《中国文物报》1998年7月29日。
《贵州文博事业迅速发展》，载《当代贵州》1998年11月第11期。

1999年

《调查 保护 研究——我省民族文物工作回顾》，载《贵州日报》1999年1月14日。
《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成功范例——郎德铜鼓文化活动调查》，载《当代贵州》1999年2月第2期。
《贵州民族文物的调查征集与分类》，载《贵州文物工作》1999年3月第1期。
《侗文化的现代价值》，载《贵州日报》1999年7月8日。

《丰富的贵州民族文物资源》，载《贵州民族报》1999年9月27日。

2000年

《做好大开发中的文物工作》，载《贵州日报》2000年6月27日。

《珍视独具特色的贵州民族文物》，载《贵州日报》2000年9月19日。

《充分发挥民族文物在西部大开发中的积极作用》，载《贵州民族研究》2000年10月第5期。

2001年

《完善旅游线上的系列专题博物馆》，载《贵州日报》2001年4月5日。

《黔山文物史迹网》，载《贵阳日报》2001年12月24日。

2002年

《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协调发展的成功实例》，载《贵州日报》2002年10月6日。

《贵州民族文化的旅游价值》，载《文化广角》2002年10月第10期。

2004年

《贵州民族文化之我见》，载《贵州日报》2004年1月4日。

《多元一体 各有千秋——贵州建筑与徽州建筑之比较》，载《古建园林技术》2004年3月第1期。

《贵州的桥》，贵州科技出版社，2004年10月。

2005年

《郎德上寨的苗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

《贵州民族文物的地方特点与民族特色》，载《中国文物报》2005年4月1日。

《变严肃为活泼 贵州因地制宜建设博物馆》，载《中国文化报》2005年5月19日。

《开放式保护民族村寨的理论与实践》，载《文物工作》2005年5月30日第5期。

《于细微处看精华——深入发掘贵州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载《贵州日报》2005年6月28日。

《文化与旅游协调发展的成功之路》，载《小城镇建设》2005年10月7日第10期。

《构建“盘江文化史迹网”》，载《文化广角》2005年10月第10期。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贵州民族文物的现代解读》，载《贵州政协报》2005年10月13日。

2006年

《从贵州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开展民族文物工作》，载《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6年1月第1期。

《全球化有利于民族优秀文化的生存和发展》，载《全球化背景下的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

《民族团结教育的特殊教材》，载《苗侗文坛》2006年4月总第48期。

《抢救民族文物迫在眉睫——从贵州民族文物工作说起》，载《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6年7月第3期。

2007年

《郎德苗寨博物馆》，文物出版社，2007年12月。

《青龙洞民族建筑博物馆》，文物出版社，2007年12月。

《关注贵州文物的独特价值和文化生态》，载《贵州文物工作》2007年12月3—4合刊。

2008年

《贵州生态遗产研究》，载《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8年3月第1期。

《用活民俗文物，办活民俗博物馆》，载《中国文物报》2008年4月13日。

《从实际出发做好贵州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载《文物工作》2008年4月30日第4期。

目 录

序一	马自树 /1	仡佬族的居住文化 /41
序二	祁庆富 / 3	彝族的居住文化 /43
		瑶族的居住文化 /46
		汉族的居住文化 /50
前言 / 6		(四) 附属建筑 /53
		贵州高原的粮仓文化 /53
第一编 建筑文化 /1		白皮纸作坊与苗文化
一、民族村寨 /1		——丹寨石桥白皮纸印象 /58
(一) 苗族村寨 /1		(五) 公共建筑 /61
苗岭山区雷公山麓的苗族村寨 /1		苗岭山区的寨门 /61
武陵山区的苗族建筑 /7		苗寨的桥 /64
(二) 侗族村寨 /14		苗寨铜鼓坪 /67
侗寨建筑		苗寨龙船棚 /69
——百越文化的活化石 /14		(六) 村寨建筑的保护利用与研究 /71
三门塘的民俗建筑 /25		保护历史文化村寨必须用好旅游这把
(三) 居住文化 /33		双刃剑
苗族的居住文化 /34		——以郎德上寨为例，谈民族文化
布依族的居住文化 /36		的保护与开发 /71
侗族的居住文化 /38		深入发掘民族村寨的文化内涵 /75
水族的居住文化 /39		

二、传统建筑 /83

(一) 桥梁古道 /83

贵州桥文化 /83

驿道 /108

纤道 /112

关隘 /114

(二) 渡口码头 /116

渡口 /116

码头 /119

(三) 古塔牌坊 /123

古塔 /123

牌坊 /126

(四) 城堡营盘 /131

福泉古城 /131

海龙屯 /134

边墙 /137

(五) 衙署建筑 /140

土司衙署 /140

流官衙署 /144

(六) 书院文庙 /147

书院 /147

文庙 /152

(七) 会馆祠堂 /161

会馆 /161

祠堂 /173

(八) 佛寺道观 /183

贵州的佛寺道观 /183

贵阳城区的佛寺 /190

黔北地区的著名佛寺 /194

(九) 庙宇神祠 /199

庙宇 /199

神祠 /201

(十) 其他古建 /203

文昌阁和甲秀楼 /203

四官殿 /206

招堤 /207

(十一) 古建装修艺术 /208

石柱础 /208

建筑物上的白菜、南瓜与莲花 /211

建筑物上的蝙蝠、大象和猴子 /213

青岩镇的建筑装修 /214

(十二) 贵州建筑文化研究 /217

贵州的建筑文化 /217

贵州明清古建筑民俗特色浓郁 /219

多元一体 各有千秋

——贵州建筑与徽州建筑之比较 /222

贵州古建筑的发展轨迹、地方特点

和民族特色 /226

第二编 节日文化 /233

贵州的民族节日 /233

论民族节日的文物价值 /252

被视为不可移动文物的节日

活动场所 /257

节日文化飞向海外 /272

第三编 服饰文化 /277

穿在身上的史书

——贵州民族服饰研究 /277

两件苗绣珍品记载的历史 /281

民族服饰中的仿生学 /284

苗族蜡染刺绣中的卐图案 /291

服装是民族的重要表征

——美国苗族服饰与贵州苗族服饰

之比较 /293

“奥满襟”

——传统与时髦相结合的结晶 /296